

16
清
朝
文
獻
叢
刊

清
朝
文
獻
叢
刊

第一輯



目 录

序 言	(1)
往事回忆录	黄梦飞 (3)
我任绩溪县长前后	陈必旼 (47)
抗战风尘记	程中一 (63)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路过绩溪行动纪要	
.....中共绩溪县委党史办公室	(83)
北伐军在绩溪	吴嗣恒 (92)
葛剑寒遗稿三则	(94)
抗战时期日机轰炸绩溪城目击记	章希吕 (99)
日机轰炸绩溪见闻补遗	程宗福 (102)
竖立“李懋延虐政石”始末	胡君佩 (103)
附录《民贼李懋延之罪状》	
抗战时期霞间中英克强训练班	邵之方 (107)
“五·四”前后绩溪民族资本家的办学热潮	
.....胡秀逸	(110)
绩溪县图书馆史略	徐子超 (117)
抗战前后绩溪城区商业概况	吴社善 (120)
绩溪民间徽戏活动的衍变	胡家祺、张正夷 (129)
绩溪蚕桑生产史略	胡士敏 (141)

绩溪缫丝厂创始记.....汪影鹤 (150)

许家朋烈士.....胡其佳 (154)

胡晋接简介.....胡广范 (160)

梦飞同志二三事.....单乙生 (163)

程士范事略.....李成荃 (167)

忆程士范先生与淮南铁路.....石原皋 (173)

汪孟邹与芜湖科学图书社.....程敦信 (181)

洪范五先生事略.....季维龙、刘重煮、罗友松 (184)

忆吾师洪范五先生.....刘重煮 (193)

回忆胡稼民先生.....周起家 (201)

忆胡稼民老师.....胡仲雍 (207)

许怡荪与胡适.....汪菊农 (210)

汪惕予创办自新医院及其它.....胡乐丰 (215)

澄心堂出处考.....胡钟吾 (220)

序 言

绩溪县内山溪交错萦流，以地理特征而名县。汉为歙县地，属丹阳郡。晋属新安郡。南朝梁大同元年（535），析歙县地置梁安县，唐武德中废。永徽五年（654），析歙县地置北野县。大历元年（766），置绩溪县，属歙州。宋属徽州。元属徽州路。明清属徽州府。

绩溪地处江南，历史悠久，文华荟萃，气候宜人，雨量充沛，资源丰富，物产众多，素称“蚕桑之乡”，是通往著名旅游胜地黄山、齐云山、太平湖的必经之地。

在各个历史时期，绩溪曾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时期，就成立了党的地下组织。此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绩溪人民不断开展革命斗争。解放后，旧貌换新颜。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绩溪的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绩溪文史资料极为丰富，如何妥善的征集、研究、整理和编辑出版这些史料，在人民政协的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对于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编辑、出版《绩溪文史资料》，是我们文史工作者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亦为对此关心者所渴望。

《绩溪文史资料》，主要收集绩溪县自戊戌变法以来的近、现代史史料，并以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为主。在征集、编辑和出版过程中，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使之在新的历史时期，为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为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促进绩溪经济腾飞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编辑、出版《绩溪文史资料》第一辑的过程中，得到了有关单位和人士的热情支持，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和意见，胡景宪、汪光泽、胡士敏、汪均安、胡家堤、徐子超等同志参加编审了本辑“资料”，许庭义、汪海同志承担了本书的校对工作，谨此致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难免有遗误之处，恳请各界人士批评指正。《绩溪文史资料》，今后我们将继续不定期整理，编辑出版，为此，热忱地欢迎绩溪县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和旅外同胞，不断地给予支持和帮助，也欢迎大家惠稿。

胡其佳

一九八五年四月廿三日

往事回忆录(辑要)

黄梦飞

我的出身

一、家庭环境

我家祖居绩溪县东北乡的丛山中，离城四十里，村名石金山，世代以务农烧炭为业。到我祖父，自幼在浙江做生意，后来捐了一个“未入流”的官，在浙江候补，做了几任巡检、典史，遂挤入缙绅先生之列。他做官积了一点钱，先后买了十几亩田地，一部份由我祖母自己耕种，大部份佃给农民种。

我父亲自幼读书，但没有考上秀才，祖父给他捐了一个“从九品”的功名，在浙江省慈溪县做过一年多典史。祖父去世时，他丁忧回家。这个时候，我才满十三岁。因为兄弟众多，家计困难，父亲就自己种田，母亲也下地劳动，这样持续了七、八年。我每个假期从学校回家，也经常和兄弟们一道，帮助放牛、打柴、浇菜、锄草，做一些零星农活。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我当了教员，大哥跟着一个做知县的父执到江西做事，三弟也找到了商店生意，家庭生活逐渐脱离困境。为了母亲病重便于就医，就在城里赁屋居住。父亲则往返城乡，仍种了几亩田地，其余都佃给农民耕种。又过了

几年，我们兄弟妹四人（四弟幼殇，五弟出嗣）分了家，每人有田地三、四亩。从此以后，家庭生活来源，主要就靠我们兄弟的工薪收入了。辛亥革命后，我父亲除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做过一次县议员外，始终没有担任过其他职务。

我出身于这样一个几经变化的家庭——原来是小官僚、小地主，其后没落了。到了我本人做了教员，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二、时代背景与所受教育

我生于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正是甲午战争大败于日本的一年。又三年（一八九八年）而有戊戌政变；又二年（一九〇〇年）而有义和团反帝运动、八国联军入京师；又四年（一九〇四年）而有日俄之战，我国东北领土沦为帝国主义战场。当时瓜分之祸，迫于燃眉，而腐朽顽固的满清封建王朝仍坚持“宁予外人，不予家奴”的民族压迫政策。于是有志之士认识到，非革命无以图存，非排满无以御侮。人心动荡，满清王朝的基础摇摇欲坠。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里成长起来的。

我五、六岁时，母亲就教我识字。八岁（满六岁）入私塾。塾师是程长和先生，跟他读过《四书》和《诗经》。十二岁（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满十岁）时父亲送我进绩溪县东山高等小学堂，祖父还亲自到学校里拜托同他有交谊的教师特别关照我。当时他们对我的希望，仍不外乎功名利禄，荣宗耀祖，学校不过是变相的科举（清政府曾有规定：小学毕业，赏给附生出身；中学毕业，赏给贡生出身；高等学校毕业，赏给举人出身。还是从前以科举羁縻人才的那一

套)。他们的心情，我那时是不能理解的，我只是对读书认真，很想多获得一些知识，将来能够出人头地。因此，正课之外，还喜欢找一些书来读。特别是寒暑假回家，除帮助做一些农活外，整天看书，不多讲话，乡父老都以为我是书呆子。由于没有人指导，家中的好书又很小，有些无用的书也读了。我记得《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纲鉴易知录》读了许多遍。《国语》、《战国策》等书也读过。我父亲还买了《东莱博议》等书给我读，我自己还读了一些《新民丛报》里的文章。这些书，对于我的政治思想和文学修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我才满十四岁，小学还没有毕业，当时幼稚的想法，以为富国强兵，必须青年投笔从戎，因而准备投考安徽陆军小学。也因为这类学校，完全公费，每月还有几两银钱的津贴，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后来自己检查目力，已患了近视，只好放弃学习军事的念头，于次年考入新安中学堂。我在新安中学堂不到两年，成绩还好。由于喜欢看报，注意时事，对于政治逐渐发生兴趣。眼见国力孱弱，不断受列强欺侮，引为奇耻大辱。我曾看过《岳传》，仰慕岳飞的忠勇爱国，因自号“梦飞”以见志，并取一室名，叫作“披褐谈兵室”。我原学名宗培，字树人，从此就废弃“树人”不用。到一九一二年，开始在安庆读书，宗培的学名也不用了。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安徽总支部在省城设立地方自治研究所，要各县支部派党员前往学习。次年春（一九一二年），我与胡咸佳、胡在渭由绩溪县支部保送前往该所学习了两三个月。这个所的学员，青少年很少，课程也不合我的理想。时适江淮大学成立（也是国民党办的），我就转考该校文科

肄业。次年，二次革命讨袁失败，江淮大学改组为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我转入法本科学习。这时，北洋军阀倪嗣冲督皖，残杀国民党人甚多。我因曾在报纸上撰文声讨袁世凯，我母很不放心，一再函电催归。加以家庭经济情况不好，父亲负担不起我的费用，不得已，遂于是年端午节前辍学回家，结束了我的学校生活。

三、在教育界服务十三年

在旧社会，人们所从事的事业，往往是与主观愿望不相符的。我在幼年的时候，受了时代的影响，关心政治，有志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效力。但由于封建统治势力的威胁和家庭经济的困难，年未弱冠，就不得不放弃学习，厕身于教育界，作衣食的奴隶。这不是我始料所及的。

我在读书期间，以“端品好学、少年老成”为乡里所称道，老师宿学，无不青眼相看。一九一四年，我失学归里，胡氏小学校长胡效颜就来订约，聘为级任教员（该校薪金很薄，每学期只五十元）。那时这个学校在徽州地方是负有相当声誉的。我为了家庭人口众多，母亲又患了严重病症，经济非常困难，就答应了下来。这是我从事教育事业的开始。半年之后，县立高等小学改组，新任校长胡映江约我去担任级任教员。我在该校一年半，虽是一个级任教员，但校长依靠我筹划一切，实际上我承担了全部的责任。一九一六年（我实龄二十岁）暑假后，我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设在休宁万安）之聘，担任国文教员，兼第三班舍监，后来还教过历史和经学。我在二师教学整整五年，曾以成绩优异获得当时北京政府的七等嘉禾勋章。校长胡子承先生，在当时的安徽教育界声望很高，学生课业成绩，一般来说是很不错

的。不过他的思想落后于时代，又坚持教育是清高事业，办教育受教育的人，都不应过问政治。在这种思想统治之下，二师学生暮气沉沉。“五四”（一九一九）以后，我接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对于他的这种主张和作风起了反感。一九二一年，安徽省议会改选，我县教育界青年为了反对安徽土豪劣绅集团——公益维持会的把持操纵，推我出来竞选省议员，和他们对抗，我答应了他们，作了一些布置。子承先生知道后，要我停止这种政治活动，我就以意见不合，提出辞职，离开了二师。那时的选举，总是要花钱的。我是一个穷措大，当然坚持不下去。后来接受了芜湖方面汪孟邹（同乡）、刘希平（老师）先生等人的意见，让给芜湖明远电气公司总经理吴兴周，并为他负责活动，结果，吴当选了省议员。

我在绩溪高小和二师教书期间，还担任了绩溪县教育会会长，出过会刊，组织过宣传队，下乡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又与一些学生倡导组织了天足会，做了一些反封建的活动，为城乡恶势力所嫉视。

我离开二师后，由汪孟邹等芜湖方面友人的介绍，应省城第一农业学校之聘，任国文教员。我到校时，该校正发生反对校长孙筱初的风潮，闹得很大，我没有上课，就离开了。风潮背景，当时不很清楚。不久，孙筱初、章铸黄、张耀煊等开办《皖铎报》，聘我当编辑。过了一个多月，会见了刘希平先生，他劝我离开《皖铎报》。这时，我才知道，孙筱初也是公益维持会分子，《皖铎报》的后台老板，则是公益维持会首脑、省议会前议长晋恒履。我得知内幕，非常懊悔，即日辞职去芜。这年寒假期间，孙希文接办《安徽

通俗教育报》，聘我为总编辑。一九二二年二月，安徽六邑中学约我兼任该校一班国文教学。我教了半年，没有再继续。《安徽通俗教育报》，孙希文虽是经理，但他耽于安逸，不很管事，经理的事，也是我代办的。我在这个报任总编辑时间比较长，从一九二一年年底起，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北伐军进军两湖，我们被迫去沪的时候为止。与此同时，我还担任过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国文教员一年，省立第一中学文史教员三年，兼任省立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半年。总计我从一九一四年起，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因参加北伐工作离皖去沪为止，担任教育工作，头尾共十三年。我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也没有在哪个学校毕过业，学术方面毫无成就。十多年，为人师，而且在学生中有相当的信仰，不是因为学问有根底，教学有资本；主要原因，由于那时思想比较进步，教学认真负责，对于青年学生，平易诚恳，能够打成一片，这是比较同时一般教文史的先生们差强人意的地方。那些年月中，教书以外不忘学习，自语文、政治、社会以至教育理论方面，经常读书研究，颇获教学相长之效。我在文化方面的缺陷，经过十多年来从事教育期间的实心学习，部分地得到了补救，有一些进步。

在大革命前后

四、我与国民党的关系

辛亥武昌起义的时候，我正在新安中学（在皖南歙县）读书。由于这次革命的政治号召，是以“驱除鞑虏，创立民国”为主要宗旨，完全合于我反对满清专制，反对列强侵略

的爱国思想，因而以崇拜英雄的心情来崇拜孙（文）、黄（兴），并与一部份同学首先剪去辮发，以表示对于革命的欢迎。

次年（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我的父亲原是同盟会会员。这时，可能由于他的关系，国民党绩溪县支部选派我入国民党办的安徽地方自治研究所学习。我于行前，参加了国民党，时才满十六岁。又次年（一九一三年），宋教仁被刺，国民党发动讨袁，我在报纸上发表了讨袁的文章，语气很激烈。二次革命失败后，我因避祸，辍学回家，从事教学，与国民党的关系中断。

一九二一年，我在省城（安庆）教书。这时，中华革命党已改为中国国民党。安徽方面，由管鹏主持，还没有正式组织。我由管鹏、孙希文介绍，重新入党。后来（在一九二三年），刊行《民治报》，我曾写过文章。《民治报》发行没有几天，就被吕调元（伪省长）他们封闭了。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的政治面貌和组织形式都有很大的变化。我省的老国民党党员原来有柏（文蔚）、管（鹏）两派，争权夺利，水火不相容。柏文蔚、管鹏等上层领导分子，在进步党员和革命青年心目中已失去信仰，不能再起领导作用。这时，我省在上海读书的共产党、国民党党员王步文、王同荣（共产党员，后来变节），谢硕等许多人回到安庆，怂恿我出来负责进行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创始工作。他们认为我是老党员，但年纪不大，又不属于柏、管两派，而且在省里几个中等学校都教过书（这时在一中一师教文史），兼主编《通俗教育报》，

与知识青年有广泛的联系，做这个工作，比较合适。我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开始组织区分部，吸收党员，并利用《通俗教育报》来作宣传。第一区分部，就设在报社内，我担任书记。一面报告上海执行部，取得联系。就这样，在大概一年的时间内，省城地方组织了两个区党部，五、六个区分部，成立了第一区党部，我担任常委。这个区党部，在短期内成为国民党在安徽省的一个联络处。由于这个区党部的联系，有三十多个县，先后都成立了组织。当然，其中也有自发组织起来的，后取得联系。安庆市党部成立较晚（一九二五年年底），周新民任常委，我也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省城的追悼会，也是在第一区党部的领导下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安徽代表选举，由广州中央电派我和周范文负责办理。结果，我与沈天白当选为出席代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初赴广州。

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我被派为安徽省党部筹备委员。筹备委员共九人，为光明甫、常恒芳、沈子修、朱蕴山、史恕卿、周松圃、周范文、薛贞汉（共产党员，已牺牲）、中央领导同志，我只见到吴玉章（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谭平山（中央组织部部长）两先生。请示后就回皖进行工作。次年，安徽省党部在武昌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我被选为监察委员。七月底，奉派与童汉璋（已故）赴南昌，代表安徽省党部，参加“八、一”起义，就随军南征。流沙失败，回上海，因为南京国民党反动派于清党时将我党籍开除，并下令通缉，我就暂居上海租界，与国民党的关系又一次断绝。

五、参加社会运动

我幼小时期所处的社会，是封建势力统治的社会。由于爱国心的驱使，纯朴的思想，有革故鼎新的要求。辛亥革命以后，接触到一星半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如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学说），遂倾心于民主自由，反对专制压迫。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民生艰困，过于满清。我出于正义感的驱使，对于军阀官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这些封建势力深恶痛绝。“五·四”运动以后，进一步认识到封建统治阻碍着国家的进步，因而在安徽自发的反封建的社会运动中做了一些工作。可惜的是，当时对于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没有认真的研究，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及革新发展的趋向，懵然无知。支支节节摸索前进，费了许多力气，一无所成。

我参加安徽反封建的社会运动，是在一九二一年到安庆以后的事情。但到安庆以前，在家中也曾闹了一次“虐政石”的风潮。大约是一九一八年前后，我县（绩溪）县知事李懋延凭借段祺瑞关系，恣睢暴戾，作恶多端。卸任的时候，由教育界发起立一“李懋延虐政石”于南门外。继任张某，因李势大，接受他的嘱托，着人在夜间偷偷地将石碑砸毁。次日发觉，群情大愤，集于商会者数百人，同往质问，把县政府包围了起来。张知事在群众的压力下，终于答应了大家的要求，答应石碑竣立后，予以保护。现在绩溪县南门外，这块虐政石还存在（此碑在五十年代后期拆城墙建环城路时已搬掉，现不知下落——编者注）。那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我那时兼教育会会长，是这次行动领导人之一。

大革命以前，安徽的社会运动，可以说是反对北洋军阀的运动。运动主力是学生和教育界中的进步分子，以及社会

上一部份有正义感的人士。“姜高瑜惨案”（六二惨案），是反对倪嗣冲系军阀官僚豪绅集团——安徽公益维持会的结果。那时我还在第二师范教书，没有参加。与这个案子有连续关系的，是一九二一年驱逐伪省长李兆珍的运动，刚刚在我到省的那一天，群众包围了省长公署，李兆珍被驱逐离省。我实际参加的社会运动，一为废督裁兵（反对督军张文生），二为驱逐马联甲，三为反对吕调元，四为反对贿选，抄猪仔议员的家。前面三项运动，都是采取上公文、发电报、派代表向北洋政府请愿的方式。我因为主编《安徽通俗教育报》，在这些运动中，主要是配合做了一些宣传鼓吹工作。反对贿选总统曹锟，抄猪仔议员的家，大约是在一九二三年，以学生为主力，采取群众游行示威的方式。在安庆抄了张伯衍、何雯两家，在芜湖抄了彭昌福、吕祖翼两家。当时在安庆主持策动的，有王步文、郑鼎（即李云鹤）等，我和蔡晓舟等是这次运动的积极支持和参加者。我省这许多次的社会运动，由于我们思想上的局限性，对中国革命说不上有什么意义；但是，这些运动在反抗封建统治，伸张社会正气方面，却轰动远近，受到各方的注视。特别是一些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后来大多数参加了大革命，因而，这些运动，也可算作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安徽地区的序幕。

六、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五·四”以后，一些左倾青年把我看作进步教师。其实，我于政治学说，革命理论，并无系统的研究，革命的思想基础是很薄弱的。我所以参加大革命，由于我是一个老国民党员，少年时代就有民主自由的要求，我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认为不打倒封建军

阔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民就无法生活，政治就难上轨道，国家就不能强盛。到了大革命前几年，读了《向导》、《觉悟》等刊物，才明确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封建，更要反对帝国主义，世界革命的前景是走向社会主义。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我就在一些左倾青年的鼓励 and 帮助下，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在北伐前，我除联系各县国民党和共产党同志进行各县的国民党组织宣传工作外，首先与西山会议派进行了斗争。安徽的西山会议派，有管鹏、陈紫枫、管曙东、凌昭等，以管鹏为首领。他们在我赴广州出席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成立了省党部，并在报纸上登出启事，说已派我为代表赴广州向中央请示，企图以此蒙混一些不明情况的同志。在国民党未分裂之前，我与管鹏等本有往来，管鹏对我也很推重；不过他们劣迹多端，信誉扫地，我已有所闻，实在看他们不起。我自广州回来后，明瞭此种情况，仍往宣家花园（西山派的省党部所在）同陈紫枫等谈判，要求他们取消组织，服从广州中央领导。陈等以中央发表的省党部筹备委员光明甫、周松圃等没有国民党党籍，不能领导为辞，坚持错误主张。我就当面声明，和他们划地绝交，各行其是。并於次日登报，揭露管鹏，陈紫枫等劣迹，否认我与宣家花园伪组织有何种关系。这样一来，许多老党员也不到宣家花园去了，他们的党部成了空架子，甚至他们的委员中孙文学会分子王持华也不赞成他们所为，和他们脱离关系。陈紫枫等日暮途穷，竟采用卑鄙手段，派人驻在蚌埠，私刻各种社会团体图章，向军阀陈调元告密，说我们赤化。一九二六年七、八月间，陈调元密令省会警察所搜查教育会（我们省党部设在这

里)、通俗教育报社、法政专门学校和第一师范等。我和沈子修、朱蘊山、周松園等事前得知消息，逃往上海，并在上海交待新闻界，声讨陈调元。

其次，与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安徽的国家主义派，有刘戟黎等人。北伐以前，他们积极在教育界和学生中活动，发行刊物，反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破坏国民革命。我们以《通俗教育报》为武器，驳斥他们的谬论，阐扬“三大政策”等等，在青年中有良好的反应。不过，这个报的经费，是由教育经费项下开支，要受教育所的监督。教育所由于反动分子的检举，制止我们登载这类文字。我们不得已，自己凑了几个钱（那时我们干革命工作，经费没有来源，都是私人掏腰包的），刊行了一份八开小报，随同《通俗教育报》送阅，定名为“寸铁”（《向导》里有“寸铁”一栏，取以为名）。结果，扫除了国家主义派在安徽青年中的坏影响，推进了国共合作期间的革命工作。

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已下武汉，我们由上海经往汉口，设在安徽省党部办事处于联保里三十三号。这年冬，安徽宣慰使署成立于太湖，中央派常恒芳为宣慰使，率领李少南、陈雷等部武装进迫安庆。我受省党部的派遣，驻宣慰使署，代表省党部进行工作。不久，军事失利，宣慰使署退驻黄梅，我在黄梅住了一两个月。

一九二七年春，国民革命军东征，我受省党部指派，与童汉璋等几个工作同志先行秘密回省，恢复省党部工作。记得当时有一件事情，我没有敢做，至今犹感遗憾。原来，驻省城的军队两个团是前安武军（倪嗣冲旧部）改编，不是陈调元嫡系，大都是颖、亳地区的人。有几个国民党老同志做